

跨国垄断资本与主权国家的当代矛盾

——论当代新资本形态内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

牛子牛

摘要 在 21 世纪进入 20 年代之际，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局势的深度调整，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被暴露出来，即金融化和全球化进程所造就的跨国垄断资本同主权国家本身之间的矛盾。它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时空不平衡这一矛盾的当代表现。跨国资本同主权国家在当代相互依存、相互挟持，但其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这种冲突削弱了垄断资本同资产阶级国家联合起来遏制工人力量的能力，导致了经济活动的资本积累功能和社会治理功能的分离；它在资本同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裂隙中孕育着新的革命契机，也为新兴国家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

关键词 跨国垄断资本 主权国家 全球化 帝国主义 新资本形态

作者牛子牛，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1)07-0036-09

在全球化正值鼎盛的 2000 年，哈特和奈格里的名著《帝国》的出版成为了一时间颇受关注的思想事件；它预言当代的全球统治形式已经脱离了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帝国主义形式，转入了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资本所主导的、内外边界模糊的“帝国”形式。但是，在 21 世纪进入 20 年代之际，我们却观察到“帝国”正在瓦解：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化红利耗尽的背景下，各国纷纷收缩开放尺度，保护本国利益；“主权国家”的形象重新被凸显为一种同全球化相冲突的政治力量。

当然，全球化的收缩并不意味着简单退回到全球化之前的世界格局中去，即退回到传统的帝国主义格局中去。实际上，全球化的收缩要受到全球化本身的制约，而“帝国”的瓦解也是帝国的一种表现形式。具体来说，全球化遗留下来了一种新的资本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将整个全球生产网络联系在一起跨国资本；但是，它同主权国家之间协同增长的蜜月期却已接近尾声。这一局面导致跨国资本同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张力逐渐加剧，从而影响了全球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当代的具体表现。关于 21 世纪国际统治形式的既有讨论，如“帝国”或“新帝国主义”等理论，或者认为主权国家这一政治实体正在被生产的社会化过程所消灭，或者认为主权国家同垄断资本之间的关系仍像传统帝国主义时期那样亲密无间，但均低估了国家同当代新资本形态之间发生矛盾的可能性，以及这种矛盾对当代世界的形塑作用。

本文试图说明，跨国资本同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主要形式之一。这一矛盾是在过去三十余年的全球化浪潮中，由金融垄断资本本身的发展所塑造的，它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时空不平衡这一矛盾的当代表现。跨国资本同主权国家在当代相互依存、相互挟持，但其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这种冲突在当代不平等的国际秩序的不同层次上表现出了不同的面貌。这种矛盾所孕育的新的革命契机，不仅像在帝国主义时代那样，存在于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

地域性的矛盾当中，也存在于跨国资本同主权国家之间地域性的或非地域性的矛盾当中。

一、当代新资本形态的形成与资本同国家间关系的变动

资本同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传统中是一个恒久的议题。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著作，至少在较为抽象的理论层面上，资产阶级国家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派生物。例如：“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①，“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②，等等。因此，资产阶级国家很少有机会同资本本身发生决定性的矛盾。或许，只有在无产阶级占领了国家机器、并将其反过来对准资产阶级之时，现代国家才表现为资本铸造来毁灭自身的武器。在马克思之后，列宁首先将主权国家当作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当中不可化约的一个变量。列宁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发展的地域性不平衡，使得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一国率先取得胜利；在这一语境下，资本逻辑在多个主权国家之间不平衡的现实布展，始终是反抗资本的革命得以可能的内在条件。在后来的中国革命中，列宁的相关学说又发展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理论与革命策略。然而，如果说列宁关于在一国之内夺取革命胜利的思想至今仍有历久弥新的价值的话，那么他关于垄断资本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论述，则更多地是针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特殊局势的。列宁吸收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将金融资本界定为同产业资本联合在一起的银行资本，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欧洲的特殊情况；但是，这种做法却相对高估了各部门资本同国家之间亲密合作的程度，同时相对低估了金融资本同产业资本之间、金融垄断资本同国家之间发生矛盾的可能性。

然而，这些矛盾的可能性在 20 世纪初期毕竟没有爆发；相反，国家同垄断资本之间日益紧密的联合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现实。当时诸多重要的理论家都已经感到，这种联合不利于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局势的发展。这是因为，国家通过将工人组织和工人政党纳入议会政治的范围，让相当一部分革命力量投入了有关劳动待遇的“议会斗争”当中，而不是以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为目的的革命行动当中。同时，包括国家公职人员、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等在内的“中间阶层”的兴起，也在工人阶级内部造成了分裂，从而缓和了“阶级对立简单化”^③的趋势。例如，恩格斯在晚年认为，“在阶级斗争中，中间阶层大概永远不会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就是说‘人民’看来将总是分开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像在 1848 年那样非常起作用的杠杆了”^④。基于这一背景，恩格斯提出工人可以利用选举权开展议会斗争。而时代相距不远的马克斯·韦伯，尽管对社会主义革命持不信任的态度，但也同样洞见到了类似的趋势：“在各项公办公事业和专业协会当中，是公职人员而不是工人独揽大权；工人想在这方面通过罢工来达到什么目的，比在私人企业当中还要难。无论如何，当下正在到来的是公职人员的专政，而不是工人的专政。”^⑤

国家同垄断资本之间这种深度嵌合的关系，尽管时有波动，但大体上持续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在此期间，如著名的劳动过程学者爱德华兹所言，“官僚控制成功地加速腐蚀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自然’边界……在工人的经验和意识中，公司从资本所有者的创造物变成了一个社会机构”^⑥。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干预政策和福利国家体制，通过提高工人收入、激励大众消费等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将工人的革命热情疏导到了提高个人物质生活质量的欲求当中。这一系列因素，让发达国家的革命局势陷入了长期低迷的状态，也让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陷入了某种“后革命”氛围之中。

但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内部一系列调整的展开，垄断资本同主权国家之间的深度嵌合关系渐趋松动，二者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些有利于新的革命形势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36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3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32 页：“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48 页。

⑤ M. Weber, "Socialism," in 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eirs eds.,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92.

⑥ Richard Edwards, *Contested Terrain*,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9, pp. 159-160.

的因素。为了摆脱 70 年代的“滞胀”危机，西方国家采取了“新自由主义”“金融化”“新经济”等数个阶段的调整措施。首先，通过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商品化、国家干预的收缩和社会福利的削减等，大部分社会资源进入了由市场调节的商品化流通之中。其次，通过打击工会力量和工人政党，西方国家以工人实际工资的停滞为代价重建了利润率，但这也导致这些国家的民主机构实际上失去了对资本活动进行节制的能力。再次，随着金融管制的放开，资本逐渐离开了积累过剩、投资机会稀少的实体部门，进入了享有“阶级—垄断租金”的金融部门^①，并转而通过金融资产泡沫及其产生的财富效应来调节实体部门投资的走向。这样，一个可以供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和集中、并按照自身利益对实体部门做出调节的经济环境就被建立起来。

关于金融资本，列宁已经洞见到，“金融资本特别机动灵活……特别容易集中而且已经特别高度地集中”^②。但列宁在当时未及预判的是，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和高度集中，有可能让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跨国垄断资本形成脱离于主权国家的独立利益：金融资本几乎无限制的跨国流动，迫使各国相关政策受到金融资本的盲目逐利运动的绑架，而不是让金融资本的利益同主权国家的利益相一致。如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斯特里克所说：“金融化将金融部门变成了一个跨国的私人政府，它管束着各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和它们的公共政府，但不对任何民主机构负责。”^③此外，经济结构的金融化也推进了产业资本的全球化。由于金融部门垄断了实体部门投资所需的货币供给，实体部门不得不遵循“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原则，将自身的制造业环节分包到各项成本均较低的第三世界国家，以便在短期内压低账面成本、推高股价；其结果是形成了一张几乎囊括全球所有主要国家的全球生产网络。跨国垄断资本以这一网络为载体，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主权国家的地域限制，形成了“富可敌国”的独立“经济体”。这些跨国垄断资本的行为，不仅未必同主权国家的利益相符，甚至有可能与之相悖（例如将就业机会撤出本国）。

当然，跨国资本同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对立并不是截然外在的对立，否则这一组对立就不成为一组“矛盾”了。在以往的全球化进程的塑造下，这两者在关键的方面上已然彼此依存，但在同样关键的方面上又彼此冲突；这种冲突在经济繁荣时期尚有妥协的余地，但在经济停滞或衰退时期则会显著激化。正是此种内在紧张的情形，掣肘了垄断资本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遏制工人反抗的联盟，从而有利于形成新的革命形势。

我们可以以美国和发源于美国的垄断资本为例来说明这种关系。一方面，美国垄断资本的世界性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元霸权，而美元霸权又依赖于美国军事和政治霸权的支撑；正是因为美元作为主权货币的强势地位，美国才能形成输出美元和美元资产（如美国国债）的经济增长模式，为国内的金融市场和消费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从而带动以美国为基地的垄断资本的发展。另一方面，美国整体经济安全的维持，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维持现有的金融化体制。这是因为，美国在金融化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④，而实体部门企业的投资亦依赖于资产价格泡沫的激励；这导致美国经济整体具有高度的内在脆弱性，无法承受对现有体制进行实质性变革所可能带来的经济崩溃。而且，美国亦需要通过产业链的全球化来维持本国消费品的低价格以及国民的消费主义生活，从而缓和暗中加剧的阶级矛盾。可见，金融垄断资本和主权国家，在最关键的方面上仍是彼此依赖的。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当中，这种依赖关系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主权国家仍然认为拯救了金融市场就是拯救了自己。此外，全球化进程在当时仍处于上升期，以至于国际分工的深化反而能够帮助各主权国家更快地走出危机。因此，尽管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 2008 年的危机中已经暴露了出来，但它尚未突出地表现为跨国资本同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因而也尚未发展到顶峰。然而，如前所述，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

① “阶级—垄断租金”是大卫·哈维创造的概念，起初用来描述资本通过进入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等“次级循环”过程来吸收剩余、同时赚取某种垄断租金的现象。孟捷、龚剑将这一概念拓展到金融市场，提出“次级循环的界定应更为宽泛，可将一切虚拟资本的循环都纳入其中，成为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虚拟资本循环的叠加”。参见孟捷、龚剑：《金融资本与“阶级—垄断地租”——哈维对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制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② 《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2页。

③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London: Verso, 2016, p. 24.

④ 美国家庭部门的债务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一度也很高，但金融危机之后转移为政府债务，因而有了下降的趋势。参见恒大研究院、任泽平等：《我们正站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边缘》，原载雪球网“泽平宏观”专栏，2020年3月15日，<https://xueqiu.com/4286133092/143988240>。

措施，往往难以对金融化体制做出实质性变革，反倒强化了这一体制本身。出于资本主义固有的拜物教倾向，西方国家倾向于将眼光局限在流通领域，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类政策尽管在短期内缓和了危机，却将更严重的矛盾和危机延迟到未来。例如，美联储和欧央行等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虽然暂时拯救了金融机构，但也让金融资本借机控制了中央银行，从而攫取了货币政策的制定权：“在政府和中央银行为了拯救私人银行系统而采取的措施中，公家的钱和私人的钱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今天我们基本上已经无法区分……是政府国有化了银行，还是银行私有化了国家。”^①其结果是，国家调控经济活动的政策空间遭到了压缩，跨国金融资本同国家之间的冲突渐趋尖锐。

于是，金融化体制在“后危机”时代的变本加厉，同全球化红利耗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相叠加，最终让跨国资本同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以显性的方式暴露出来。首先，金融资本利益同美元霸权之间存在着矛盾。金融资本的利润和金融资产价格的维系，有赖于廉价信贷的可获得性，也就是有赖于央行维持充足的货币供给和较低的利率；但是，长期货币超发有可能威胁美元币值稳定、进而威胁美元霸权。因此，美联储有必要周期性地调整利率，但这种做法却有可能直接戳破资产价格泡沫，从而威胁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其次，供应链的全球扩张同主权国家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之间存在矛盾。美国主要由消费驱动的经济循环以及消费部门企业的股价水平，很大程度上以供应链的全球扩张为前提，也就是以第三世界国家低廉的各项成本，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低廉的商品价格为前提；但是，制造业环节的大量外流也极大地威胁了国内的就业，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引起了种族冲突、民粹主义乃至新法西斯主义等一系列政治问题。同时，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还会迫使各主权国家为吸引私人资本流入而展开逐底竞争，竞相削减关税、税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保障，最终削弱主权国家履行民生方面职能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当代最有代表性的产业形态即信息科技产业的开放性特征，同主权国家利益的地域性特征之间也存在着矛盾。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建立一种新的、长期稳定的增长体制，全球资本主义随即采取了各种尝试方案。在这些尝试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当代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然而，这一新的资本形态同时也激化了跨国资本同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

具体来说，当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显著特征，是其独有的“网络效应”：当网络达到一定规模时，加入网络的节点越多，网络的使用价值越大，即所谓的“越用越好用”。通过这一机制，用户的使用行为成为了被平台资本所无偿占有的“协作生产力”，免费使用互联网产品的用户也成为了平台资本的免费工人。因此，互联网资本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此种协作生产力，往往倾向于低价或者免费地提供在线服务，甚至在金融资本的加持下，首先通过牺牲一部分利润来扩张网络规模，在占有了巨大的免费用户群之后，再经由其他方式来实现盈利（如出卖广告位、出卖用户数据等）。即使对于较少提供免费服务的科技企业（如微软、苹果等）来说，通过扩张网络、订立标准、拉高用户的“转移成本”等方式来收取“技术垄断租金”，也是主要的超额利润来源之一。

因此，在当代科技产业中，将产品和服务（有时是免费地）开放给尽可能多的用户使用，对资本本身是有利的；以“开源”“赋能”为名义的开放性策略，往往优于片面地赚取知识产权租金的封闭性策略。但是，对于主权国家来说，情况则恰好相反。在全球经济普遍停滞的背景下，有能力的主权国家无不希望能够预测、抢占乃至引领新一波技术变革的方向，从而在下一波经济增长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主权国家往往倾向于将本国取得的科技创新成果限制在本国范围之内，不与其他国家共享，以免在其他国家催生足以起主导性作用的技术范式和商业范式。这样，在金融—科技垄断资本的开放性策略和主权国家相对封闭性的策略之间，就产生了显著的矛盾。

此外，新的技术条件和资本形态，也催生了新的资本集中方式和垄断方式。当代科技产业中的“平台资本”和“数据资本”等的集中，不同于传统固定资本的集中：它在理论上既不需要将大量固定资本置于同一空间中以获得规模效应，也不需要切实占有这些固定资本的所有权，而是只需要通过提供在线服务或股权融资的方式，打通同用户（可能是个人、群体或企业）之间的数据通道，形成一个表面上互不消灭和

^① Wolfgang Streeck, *Buying time: The Delayed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trans. Patrick Camiller, London: Verso, 2014, p. 40.

兼并的“生态系统”。而且，科技产业的此种超空间性，同金融资本的相似属性也是相互增强的：一方面，金融资本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了超空间的快速流动，甚至变成了不可捕捉和摧毁的“云端”的存在；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超空间流动也为科技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扩张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且在其中找到了炒作的题材。这种超空间、某种程度上也超产权的资本集中方式，也减弱了资本对于主权国家这一特定空间范围的依赖，从而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二、资本积累与社会治理的分裂及其在不同国家的表现

跨国资本同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高度激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经济活动的资本积累功能同其社会整合或社会治理功能之间的全面分离。我们知道，按照亚当·斯密以及受其影响的黑格尔的观点，现代私有制下的经济活动，除了包含物质生活的维度，也一向包含着社会整合的维度：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通过普遍的分工交换来满足彼此的物质需要，从而形成了一个“需要的体系”^①；同时，在普遍交换的中介之下，从私人动机出发的经济活动也建构了一种公共利益，从而具有了“形式上的普遍性”。这两个维度共同构成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本质规定。鉴于斯密和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学界也长期存在着一种从“市民社会”视角出发来解读马克思著作的观点，这种观点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遮蔽或误用了现代社会生产中已经存在着的社会整合机制，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就在于生产活动的这种间接的社会性同其直接的私人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解决，需要诉诸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的构想，即人“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②。

但是，当代新资本形态下的社会现实却表明，资本同国家之间矛盾的加剧，阻碍了资产阶级国家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保障；因此，私有制下的生产活动的所谓社会整合功能，即便不是在倒行逆施，至少也已经失去作用了。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上文已经提及的失业、公共事业衰落和种族矛盾等问题中，而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些问题不出意料地全部被激化了。面对疫情，跨国垄断资本在债务和股价的压力之下，为了保持生产活动的连续性，希望维持消费活动和人口流动，维持国家间边界开放，缩短隔离时间，尽快复工复产；但主权国家在经济职能之外，还拥有公共卫生或“生命政治”方面的社会治理职能，因而要求在较长时间内限制工商业活动，以阻断疫情传播。这两种行为逻辑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保障和促进，而是相互冲突和遏制。如阿兰·巴迪欧所说，“我们在这里碰到了当代社会的一个重大矛盾：包含工业制成品的大规模生产过程在内的经济活动依赖于世界市场……但是另一方面，政治权力在根本上还是国家的”^③。

资本活动同国家行为之间的此种矛盾，以新冠疫情为引，造成了各种生存窘境。仍以美国为例，在制造业外流已然造成了大量失业的基础上，疫情又迫使原本用来吸收就业的消费和服务行业停止运营，从而创造了“大萧条”以来最高的失业率^④；与此同时，全球供应链高速运转的要求、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内在脆弱性，以及公共部门支出的长期衰落，又导致国家缺乏应对疫情的冗余能力，既不能果断采取隔离措施，也没有能力在维持经济运行常态的条件下控制疫情。而疫情期间爆发的“黑人命贵”抗议运动也表明，跨国垄断资本长期实施的种族分治政策，让社会的良好整合至少在种族的层面上还难以实现。

尤其吊诡的是，在全球停工停产、失业泛滥的时期，美国顶级科技巨头的资产价值却凭空暴涨。^⑤这似乎表明，尽管雇佣劳动仍是西方世界目前最熟悉的社会整合方式，但是，如今的金融—科技垄断资本通过剥削“用户劳动”、炒作资产价格等方式也能获利，因而它们同形式上的雇佣劳动以及工人需要的满足之间的关系已经日渐疏远了。换言之，当代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已经表现出了某种“抛弃社会”的迹象。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6页。

③ Alain Badiou, “Sur la situation épidémique,” 26/03/2020, <https://qq.media/2020/03/26/sur-la-situation-epidémique-par-alain-badiou/>.

④ 参见吴乐珺：《美国失业率创新高》，《人民日报》，2020年5月13日第16版。

⑤ 根据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和美国税收公平组织（Americans for Tax Fairness）分析，从2020年3月18日到5月19日，美国最富有的600人的净资产增加了15%，最富有的五个人（其中包括杰夫·贝佐斯、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三位科技巨头）的净资产增加了19%。见“Tale of Two Crises: Billionaires Gain as Workers Feel Pandemic Pain,” *Americans For Tax Fairness*, May 21, 2020, <https://americansfortaxfairness.org/issue/tale-two-crises-billionaires-gain-workers-feel-pandemic-pain/>.

与此相关，美国国会于2020年7月29日对亚马逊、苹果、脸书和谷歌四大科技行业巨头的实控人召开了有关反垄断问题的听证会，并于10月7日公布了针对四巨头的反垄断调查报告，认定其在关键业务领域拥有“垄断权”。^①这或许是当代新资本形态同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治理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明朗化的征兆。

新的社会现实要求我们更新对资本逻辑的理解，同时修正上文所述的那种从社会整合的观点出发阐释马克思思想的做法。这种阐释的偏差在于，它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等同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市民社会”，因此忽略了二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增长，而不是需要的满足。这两者之间的明确区分，只有在《资本论》中才通过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区分而被确定下来；而《资本论》的主题与其说是这两者之间的有条件的统一，不如说是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所引发的无止境的矛盾。因此，既然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活动并不必然构成一个“需要的体系”，它也就没有理由长期提供斯密和黑格尔所想象的那种社会整合方案。

实际上，马克思所指出的趋势毋宁说是相反的：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倾向，让利润表现为资本的直接产物，而不是剩余劳动的结果；因此，资本反而倾向于不断地从雇佣活人转向添置死物（如固定资本），并最终演变为脱离实际劳动过程的G-G'运动，即金融资本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所主导的经济活动的形态将越来越脱离对人的治理的需要，并逐渐将人的生活置于一个对其漠不关心的盲目过程的支配之下。这一趋势已经被相当一部分学者洞察到了。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德烈·高兹已经提出，“资本从活生生的、可感现实的世界中抽离出来，用自身增长的绝对命令取代了人类的判断标准，让自己的权力脱离了人类的掌握：资本实现了出走（Exodus）”。^②最近，我国学者杨典和欧阳璇宇也指出，金融资本利益脱离社会利益的过程，类似于卡尔·波兰尼所描述的“脱嵌”过程^③，等等。因此，当代跨国垄断资本从社会治理职能中全面脱离的现象，不仅不是资本逻辑的变异，反而意味着资本逻辑在其当代的极致发展中暴露出了本来面目。

经济活动的资本积累功能同社会治理功能之间的分裂，同时也造成了国家职能内部的分裂。这是因为，资本活动越是脱离活劳动这个基础，其内在矛盾就越是加剧，而这又反过来要求国家的干预能力更深刻地卷入资本的增值运动中，让一部分国家职能受到资本的绑架，并同另一部分国家职能相对立。我们可以将这种矛盾称作“资本的国家”同“人民的国家”之间的对立。以美联储为例，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的美股暴跌当中，美联储都多次通过提供廉价信贷的方式拯救金融机构，试图缓解本来就是由金融机构的行为所造成的危机。这意味着，主权国家的货币政策，已经成为内在于资本积累模式的一个有机组件，而不再是外在于市场活动的一种干预措施。但与此同时，中央银行也是当代最为重要的、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机构：它通过调节一些宏观统计数字（如货币供给和利率）来干预人口的总体经济活动，从而间接决定着无数个体的生计和命运。美国政府在经济危机期间尤其是疫情期间，依照“救市不救人”的原则来运用这一机构，充分印证了国家的资本积累职能和社会治理职能之间的分裂关系。

前文主要是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例，来论述当代新资本形态同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但是，由于当代国际秩序本身就内在包含着不平衡，因而这种关系在不同的国家那里势必表现为不同的形态。萨米尔·阿明在去世前不久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将当代国际支配体系当中的国家分为三类：中心国家、外围国家和新兴国家。^④笔者认为，这一分类框架对于我们眼下的讨论仍是适宜的。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处在国际统治格局顶端的国家都尚且经历着跨国垄断资本同主权国家之间的分裂的话，那么这种分裂在处境相对不利的国家那里就只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在中心国家，跨国垄断资本同国家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激烈的对抗性矛盾。这是因为，这两者的运行方式在这里都已变得十分脆弱，以至于任何一方一旦向另一方妥协，就有可能迅速摧毁自身。具体来说，金

① 参见邓圩：《谷歌、脸书、亚马逊、苹果 CEO 集体出席国会山听证会》，人民网，2020年7月30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n1/2020/0730/c1002-31804110.html>；钱童心：《美国国会公布反垄断调查报告，认定苹果、谷歌等四大科技公司滥用市场主导地位》，第一财经，2020年10月7日，<https://www.yicai.com/news/100792614.html>。

② A. Gorz, *Reclaiming Work*, trans. Chris Turn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p. 6.

③ 参见杨典、欧阳璇宇：《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及其影响——对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④ 参见萨米尔·阿明：《新帝国主义的结构》，陈俊昆、韩志伟译，《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

融资本的利益是以供应链的全球配置为前提的，而制造业一旦回流，势必对目前居于统治地位的金融资本家阶级造成损害，甚至通过提高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而对制造商和“消费者”造成损害；但是，如果政府无法有效地节制金融资本的逻辑，那么它又无法缓和国内的社会矛盾。唯一能在资本和国家之间造成妥协、在经济活动的资本积累职能和社会治理职能之间造成和解的东西，如福利国家、工人组织、制造业中的工会传统，以及包含不同阶级政党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等，却已经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被抽空了。因此，这一对抗性矛盾，最终可能导致各种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社会分裂运动的爆发。

在外围国家，即阿明所称的“买办国家”那里，政府的利益同跨国垄断资本的利益高度一致，但两者都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于是，跨国资本同“资本的国家”联合起来对抗“人民的国家”，以至于后一种国家有时被削弱到“失败国家”的地步。具体来说，外围国家的政府在频繁的主权债务危机中，按照跨国资本的意志被塑造为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府，这与随之兴起的国内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在本国建立起一种高度外向依赖型的经济，耽搁了培育民族工业的历史窗口期，并且通过资本项目的开放为国际游资掠夺本国财富创造了方便。最终，外围国家的人民不得不在政府缺乏公共事业能力的情况下，成为跨国资本廉价而无保护的剥削对象。

在上述两个类型的国家当中，我们将有可能观察到“无产阶级化”过程或“阶级对立简单化”过程的重新开启。如前所述，20世纪以来垄断资本同主权国家之间的深度嵌合关系，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塑造了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对立简单化的趋势，分裂、安抚并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垄断资本同主权国家日益分裂的趋势，却让以资本同国家的联合为基础的“中间阶层”变得难以维持下去。对中心国家来说，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工人力量的衰落和社会福利的削减就已经造成了实际工资的停滞，而制造业的外流又将大部分工人抛入了缺乏工会传统的新兴服务业部门。同时，金融资本借机诱使劳工阶层通过消费信贷和住房抵押贷款等手段来维持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生活，以便在工资收入的基础上构造起新的金融资产泡沫。其结果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劳工阶层又由于房产止赎和高额负债而进一步无产阶级化。此外，互联网和数据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让垄断资本能够通过剥削海量用户的“数据劳动”来取代“中间阶层”的脑力劳动，将后者重新抛入底层劳动者队伍或产业后备军。有报道称，最先被人工智能技术取代的劳动恰恰不是直接的体力劳动，而正是财务、法务、金融交易等脑力劳动。^①而对外围国家来说，无产阶级是随着跨国资本的进入而新近发展起来的；这些国家在现有国际支配格局的制约下，几乎都没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因而其“中产阶级”的膨胀可以说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②

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正在展开的无产阶级化或重新无产阶级化过程，挑战了从“不发达”到“发达”的“发展”叙事；这一现象表明，既有的“高收入国家”的形成，仅仅是垄断资本同帝国主义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彼此深度嵌合的偶然结果，但从长期来看，私有制下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以大部分地区和人口的贫困化为条件的。垄断资本的新形态同主权国家之间矛盾的激化，将有可能重启这一贫困化进程，从而使全世界被资本抛弃的人们重新走向联合。

三、新的革命形势的可能性与新兴国家的选择

在当代新资本形态的内在矛盾所塑造的世界格局中，如果新的革命形势可能存在，那么这种革命及其条件也将与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有所不同。在传统帝国主义时期，革命的契机根植于帝国主义的区域不平衡发展在各主权国家之间所构造的特定关系当中。例如，俄国革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内部革命的代表，是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之上、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分赃战争的机会而爆发的；而中国革命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代表，是在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剥削中国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

^① 例如，据《麻省理工技术评论》报道，高盛纽约总部在2000年的巅峰时期雇佣了600名交易员，但在2017年已经被人工智能取代至只剩两人。参见 Nanette Byrnes, "As Goldman Embraces Automation, Even the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Are Threatened," *MIT Technology Review*, February 7, 2017,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17/02/07/154141/as-goldman-embraces-automation-even-the-masters-of-the-universe-are-threatened/>.

^② 关于外围国家的发展情况，可以参见朱民：《疫情背景下双轮驱动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第5期。

斗争的裂隙中孕育出来的^①。但是在当代，由于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斗争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可能的革命形势也就不同于往日：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仅发生在多个中心国家之间、中心国家同被剥削国家之间，也发生在跨国垄断资本同主权国家本身之间。这种矛盾掣肘了垄断资本同资产阶级国家联合起来分化或收买工人力量的能力，重启了“无产阶级化”进程。只是，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同帝国主义时代在一国或几国率先取得胜利的革命一样，都不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预言的那种“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②；它们不是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思辨逻辑关系发展到顶峰之后的一次“辩证”过渡，而是资本逻辑的普遍的理想性在主权国家特殊的、地域性的现实性面前遇到不可跨越的障碍的结果。

尽管垄断资本同主权国家之间的嵌合关系在当代出现了松动和裂隙，但这还远远不等于现实革命条件的具备；相反，这一局势也内在地包含着一定程度的不可靠性。这种不可靠性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由于社会整合机制的缺乏，工人阶级本身亦尚未有成熟的联合形式。这意味着，即使革命人群存在，它的成分也很可能是游民流众、失业者、少数族裔以及“身份政治”所塑造的各种四分五裂的认同群体等，这类群体往往难以将其联合的基础建立在共同的阶级利益之上。这也是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想难以从阶级利益出发探讨革命主体问题的原因之一。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已经揭示了流氓无产阶级与金融资产阶级的共生关系，以及这种情势下革命主体的软弱性格：“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还是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只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③，“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④，等等。而当代的现实状况，同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也颇有类似之处：新冠疫情期间的抗议运动本来有望唤醒阶级共识，但它最终还是被引导到了容易造成工人内部分裂的种族议题上，甚至陷入了“为复工而革命”的悖谬状况中。这同马克思对1848年失败革命的描述如出一辙。这样看来，垄断资本同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表现形式，尽管富有潜力，但在最坏的情况下，它或许仅能做到替新兴国家“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⑤，从而为新兴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进程充当策应。

在笔者看来，当代新资本形态的内在矛盾所昭示的新的历史发展，更有可能是由各个新兴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来承担的，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导的全球秩序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首先在若干主权国家内部取得胜利的革命。但是，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尤其是对全球经济分工的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使之再也不可能纯粹地按照资本逻辑的内在必然性来发展，而只能“不纯粹”地发展。例如，中国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其实现经济腾飞的过程，同当代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过程就几乎是同步的；这两者都不可能脱离对方而独自成立。在这种意义上，当代世界必须被理解为一个继承了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世界；此种革命的遗产，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特殊的国家形态，以及它们同跨国垄断资本之间特殊的共生关系。

这种共生关系意味着，跨国资本同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内嵌于中国新时期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但是，这一当代矛盾在我国必然有着与别处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有别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新的国家形态；它既不是在经济活动之上和之外建立起来的一种“虚幻的共同体”^⑥，也不能在“资产阶级委员会”的概念下得到理解。按照汪晖的界定，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垄断

① 参见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页。“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8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2页。

⑤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6页。

资本主义地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在以民族为单位的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即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要求中建立起来的。换言之，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与民族独立和阶级整合的任务是同一的。^①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理念中，向来就包含着对资本进行批判和节制的要求，包含着用联合起来的人（作为“人民”或“工人阶级”）的需要来制约资本增殖的盲目过程的要求。在此种理念下，“资本的国家”与“人民的国家”的分裂、经济活动的资本积累职能和社会整合职能的分裂是不被允许的。

因此，在新时代的中国，国家有能力将政府的调节职能深刻地嵌入经济活动之中，通过平稳金融市场开放步伐、合理引导资本投资于实体部门、确保居民收入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等多项举措，将资本同国家之间的当代矛盾制约在一种良性正和博弈的限度之内。今天，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居于要冲地位，将越来越多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嵌入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之中，为这一格局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提供了一定的缓和空间乃至解决方案，而这种空间和方案在其他地方是不存在的。可以说，只有在此种当代视角下，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遗产才充分表现出其世界历史意义：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是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在自身内部孕育出的对自身的否定；它将有可能会调和那些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引领21世纪新文明形态的建立和传播。

如果说当代新资本形态的形成，让西方国家垄断资本的全球霸权得以空前扩张，但最终亦掣肘了这种霸权本身的存续的话，那么这种资本形态的内在矛盾的暴露，就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及其新文明形态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这一机遇不仅是当代特殊局势的特殊产物，也是20世纪以来诸多伟大的革命斗争在百年之后的回声。

（本文为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全球资本主义视域下的《资本论》研究”（19AZD00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The Contemporary Contradiction between Transnational Monopoly Capitals and Sovereign States

——On a Manifestation of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of Contemporary New Forms of Capital

NIU Ziniu

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adjustment of the worl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since 2018 and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ontemporary global capitalism has been exposed, that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vereign states and transnational monopoly capitals created by financi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t is a contemporary manifestation of the unbalanced spatial and 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revealed by Lenin and other Marxist theorists. Transnational capitals and sovereign states are interdependent but their interests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conflict constrains the ability of monopoly capital to unite with the bourgeois state to suppress the power of workers, and leads to the separ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at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economic sphere. A new conjuncture of revolution is born in the contradictory rift between capital and the sovereign state, and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are also provided for the rise of emerging countries.

Key words: transnational monopoly capitals, sovereign states, globalization, imperialism, new forms of capital

^① 参见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下）——空间革命、横向时间与置换的政治》，《开放时代》，2018年6月。“如果说‘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构成了20世纪政治的主题，那么，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寻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也必然与通过人民革命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关于这种“新的政治形式”，又见汪晖：《“亚洲的觉醒”时刻的革命与妥协——论中国“短20世纪”中的两个独特性》，《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17期。